

编者按：“新常态”是当下最流行的经济关键词。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宣告了世界经济步入“大调整”与“大过渡”的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与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并呈现出与周期性调整不一样的新现象和新规律。因此，宏观调控理论、调控模式及其工具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

提出新常态概念、建立新常态意识对于我们认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主动适应新变化、新挑战，前瞻性调整工作思路十分重要和必要。但在对新常态的理解上，还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尚处于探索之中。新常态就是新的发展阶段的一般性特征，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性变化。

2014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刊出记者许志峰和王珂采写的长篇通讯：《让发展真正绿起来——来自江苏盐城的新观察》，此文是对经济新常态的形象解读。文中说，“许多地方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在盐城似乎感觉不到。前三季度，盐城GDP增速10.9%，居全省前三，财政收入增幅居全省第一。”

“生态建设是影响发展还是促进发展？盐城的答案是后者。绿色崛起，生态赶超，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盐城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探索了一条绿意盎然的发展路径。”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本钱。盐城最大本钱就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生态空间，关键在于尊重规律、科学利用，让发展真正绿起来。”盐城市委书记朱克江说。

本期推出“经济新常态”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的关注。

本期专题·经济新常态

- 02 习近平首次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
- 04 全面准确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 06 读懂新常态
- 07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抉择

国是论衡

- 09 周瑞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错失三次良机

政治论坛

- 13 马英九首度评价习近平执政风格：确实很强硬
- 14 中组部如何选“补缺”官员

八面来风

- 18 中国想继日本之后成高铁代名词不顾一切修铁路

历史深处

- 19 中央电台当年如何报道林彪出逃事件

悦读时光

- 封三 格非解读《金瓶梅》（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习近平首次阐述 中国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主席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始发表主旨演讲,首次详细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界定、新常态影响力。

他提出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新常态主要有四大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四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他表示新常态也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习近平还表示,新常态必然伴随新问题、新矛盾,能不能适应新常态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以下为演讲全文:

习近平:

尊敬的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女士,尊敬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亚太工商界的朋友们! 去年我们在巴厘岛相约北京,今天同大家重聚,我感到十分高兴。

按照中国的节气,两天前刚刚立冬。秋冬之交是一个多彩的季节,“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银杏的黄、枫叶的红,给北京这座古都增添了色彩。经过一年的辛勤耕耘,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一道期待在即将举行的第 22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收获硕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亚太地区汇集了古老文明和新兴力量,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里的人民勤劳,这里的山河美丽,这里的发展动力强劲,这里的未来前景光明!

今天的亚太占世界人口的 40%、经济总量的 57%、贸易总量的 48%,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

今天的亚太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金、技术、信息、人员流动达到高水平。亚太大市场初具轮廓,各种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新倡议、新设想不断涌现。

今天的亚太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能源革命蓄势待发。亚太经济体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加凸显。

今天的亚太也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后续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一些经济体的复苏仍然脆弱,亚太经济提高质量和效益任务艰巨,新旧增长点转换任务艰巨,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方向和重点不一,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纷纷涌现,导致一些方面面临选择的困惑。

亚太的未来正处在关键的路口,是继续引领世界创造美好未来,还是放慢脚步等待被别人超越;是深化一体化进程,还是陷入碎片化漩涡;是践行开放、包容理念,共同开创亚太世纪,还是身体已经进入 21 世纪而思维模式还停留在过去。

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0.00%资金研报]。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的决断和行动。

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就是继续引领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就是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畅顺,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我们要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更大的努力。

我们要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朋友多了路才好走,我们应该通过坦诚深入沟通、增信释疑,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坚持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应该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共同做大亚洲发展的蛋糕,共同促进亚太大繁荣。

我们要携手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开放都是亚太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既要深化对内开放,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也要扩大对外开放,把成员多样化、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潜力和动力。既要把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到新高度,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也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推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区域合作架构,让亚太的大门始终向全世界敞开。

我们要不断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而将更多机遇留给勇于和敢于、善于改革创新的人们。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我们要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锐意改革,激励创新,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新道路、新模式,不断寻求新增长点和驱动力。

我们要精心勾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亚太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更事关各方长远发展。我们要共同致力于构建覆盖太平洋[1.23%资金研报]两岸的亚太互联互通格局。通过硬件的互联互通拉近各经济体的距离,为联接亚太、通达世界铺设道路。通过软件的互联互通,加强政策、法律、规则的衔接和融合,携手

打造便利高效的亚太供应链。通过人员往来的互联互通,促进人民友好往来,让信任和友谊生根发芽。

基于上述,中国将“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确立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主题,并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点议题。我坚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述问题上达成的广泛共识,将为亚太持久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去年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我向朋友们介绍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决心。一年过去了,我很高兴我当时的观点得到了印证。

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7.4%,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地扩大。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 风险确实有,但没有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我们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



全面准确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他指出,中国能否抓住新的机遇,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这是继今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之后,时隔半年,高层对新常态的全面解读,对于各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如何在战略上应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该指出,新一届领导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按照“新常态”在战略上审慎选择中国的宏观政策,绝非简单制造新的政策词汇,而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的战略性思考和抉择。近年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

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比如我们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去年增长了60%以上。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

下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很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习近平站在最高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高度,在解决纷争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做出了战略性选择。

习近平选择在APEC会议国际场合,全面阐述新常态,对新常态进行定调,一方面有利于“定分止争”,消除各种分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未来宏观政策。

首先,习近平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三个

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在去年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过,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重大的改革举措。目前,这些改革正在逐项地落实,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引向深入。

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活力就是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11月9日央视)

不同于过去 30 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三个特征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逻辑的体系。中国经济在经历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无论是经济基本面，还是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产业业态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经济基本面不仅发生了量的巨变，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用过去的思维思考中国经济既不准确，也不现实。以经济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在经历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常态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将在 8% 以下、7% 以上运行。以中国经济前三季度 7.4% 的速度而言，由于很多人不能准确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减速的趋势，就想当然地认为 7.4% 的增长是一个很差的速度，认为应该通过政策刺激，让经济增速再回到 8% 以上的高速轨道上去。这种高速依赖症，恰恰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这种巨变所致。正如习近平在演讲中精辟指出的：“2013 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 1994 年全年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即使是 7% 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其次，习近平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机遇，这是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在很多人看来，既然中国经济要减速，将要面临更多的是挑战而非机遇。事实上，5 月份习近平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时候，首先明确的是“中国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只是意味着速度要下一个台阶，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事实上，如果中国经济顺利完成增长驱动力的转换，增速虽然下滑，但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总体的含金量都会高于过去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期。

第三，明确提出深化改革是化解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关键，这点可谓切中肯綮。应该承认，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今天的新常态，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换上了“另一个轨道”，乘客会出

现“晕车”等各种“不适应”这很正常。如何认识这种风险，如何转换思维，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的确非常关键。比如，面对中国经济的下滑，很多人习惯了过去一下滑就刺激的惯性思维。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绝非增速下滑，而是不适应这种下滑，不允许下滑。这种风险起码有四：一是刺激依赖症；二是不改革的风险，尽管三中全会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但民间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是否因此而恢复，取决于改革的执行力，目前投资不力，民营企业仍然徘徊犹豫，关键还是没有看到改革强有力的推进，这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三是过去刺激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四是房地产全面调整带来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是继续人为刺激带来好看的数据，还是痛下决心，通过改革和创新带领中国经济走过激流险滩，这是攸关中国经济前途和命运的选择。习近平在演讲中再一次强调了“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通过改革和创新战胜风险的决心。习近平肯定了深化改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关键作用，肯定了市场和企业家的重要价值，肯定了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这种表态，对于那些一看中国经济下滑就呼吁刺激的人而言，无疑具有警示意义。笔者认为，从中长期周期而言，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海外投行期待的“崩盘”，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系统风险却随时可能爆发。而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一再延误改革时机、一再采用不当的刺激政策所致。解决这些风险，不是以毒攻毒，再次采用刺激政策，而是痛下决心放弃刺激，重回改革正途。

笔者一直坚持认为，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下一个 30 年，仍然属于中国黄金发展的 30 年，中国的增长方式将更加合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幅提升，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将更加包容，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将更为深刻和全面。但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

（2014 年 11 月 10 日经济参考报）

读懂新常态

“新常态”是当下最流行的经济关键词。提出新常态概念、建立新常态意识对于我们认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主动适应新变化、新挑战,前瞻性调整工作思路十分重要和必要。但在对新常态的理解上,还没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尚处于探索之中。我认为,新常态就是新的发展阶段的一般性特征,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性变化。

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变化、新特征:从高速甚至超高速转为中高速。新常态的首要表现或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以及在其他方面相应出现的一些变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中上等收入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世界上经历过这个阶段的国家具有一些普遍性、客观性的阶段特征。从普遍性来看,90%以上的国家经过高速增长之后都会减速。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各国大趋势基本一致,与东亚发展中国家十分接近。估计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方面,我国也不会例外,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必然的。

二是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新变化、新特征。前些年外部进入全球化高峰时期,国内正值劳动力峰值阶段,我国出现一个时期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是必然的。现在进入了新阶段,外部来看全球化回潮了,国内来看刘易斯拐点到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随之下降,并围绕潜在增长率来波动。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变化,是因为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人口资源优势等带来的人口红利,现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在消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与再配置带来的发展动力在减弱,新的动力机制有待形成。

三是经济结构的新变化、新特征。在发展动力机制变化的同时,经济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如投资率、二次产业比例可能会到达峰值,出现拐点开始下降。需求结构由过去的以投资为主慢慢地变成以消费为主,产业结构从以二产为主变成以三产为主。内外结构方面,从过去单单“商品走出去”变成资本也走出去,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成为对外经济新格局的显著特征。城乡和区域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在经历了“均衡——非均衡”过程之后,进入到再均衡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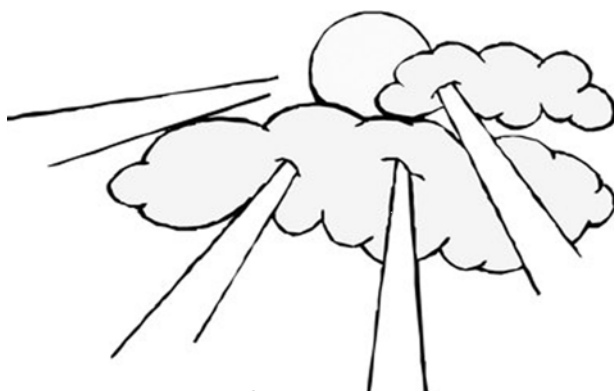
对这些新变化、新特征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常态。

理解新常态,要客观地认识新常态。当前对于新常态的讨论,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究其实质,一是新常态是客观特征还是主观愿望,二是新常态是现实状态还是理想状态。

我认为,新常态首先表现为客观特征,这是基于先发国家经验并结合国情,对我国未来发展阶段可能呈现的客观特征的想象与刻画,而不是我们对未来发展阶段特征的主观愿望或期盼。

其次,新常态也是一个现实状态,而不是理想状态。虽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实现我们的一些愿望和理想,但新常态本身是一个现实状态,表达的是一些客观特征,不能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来想象新常态。

理解新常态,要以平常心看待新常态。进入新常态,客观上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告别过去的两位数增长,由过去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或次高速增长;主观上意味着我们不再也不应追求高速度。以平常心来看待新常态,一方面意味着不必对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产生焦虑感;另一方面,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GDP视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抉择

“新常态”一词既是中央对经济时局的冷静俯瞰,也代表着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操作趋势。

在不久前河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新常态”一词既是中央对经济时局的冷静俯瞰,也代表着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操作趋势。

◇适应“新常态”

在过往长达36年的时间跨度中,中国经济经历了接近10%的年平均增长,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跃居第二位。然而,自2012年3季度以来,我国经

济已在“低位”横盘了7个季度有余。按照传统思维,一旦经济出现持续性下行,政府总会采取“总量刺激”政策。然而,新一届政府在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有条不紊推进既定的经济步调,无论是决策者所秉持的行事态度,还是宏观政策的变化幅度,都表现出少有的“定力”。

中国经济处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高层对经济下滑生态最精确性的归因分析,用经济学术语概述,“三期叠加”就是中国经济面临基钦周期(存货周期)、朱格拉周期(资本支出周期)与库兹涅茨周期(房地产周期)的叠加。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经济必须承担钢铁、

为万恶之源,刻意地人为去压速度。

理解新常态,要辩证地看待新常态。新常态是新阶段的一般状态或特征,并不意味着一旦进入新常态就一好百好,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特征,总体上是循序渐进,在发展中螺旋上升,每个阶段也有每个阶段的问题,早期可能会“快而不好”,成熟阶段可能会“好而不快”。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未来的发展阶段又好又快,而不是一下子从“快而不好”进入“好而不快”。

因此,我们必须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前面已经说到,原有的发展动力在减弱,新的动力还有

待形成。旧动力的减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新动力的形成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必然的。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进入新常态,新动力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否则就不会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了。不能因此放弃主观努力,守株待兔等待动力出现,不去加快创新和转型。正是由于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减弱了,而全球范围内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剩,给我们继续推进资本深化留下的空间比较小,所以需要我们快速跨越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动力上来,这也是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因。

(半月谈2014年第17期半月评论:作者宋立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水泥、煤炭等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化”压力,而且要消化长期依赖投资拉动经济累计而成的财政与货币风险,同时还须挤压房地产泡沫。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新型产业的成长和对接,还是对资产错配的纠正,都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因此,对于经济的换挡与减速,我们必须“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受“三期叠加”的时间约束,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可能保持着7%左右的经济增长波幅。长期来看,只要守住了底线:7%以上的经济增速、4%的失业率和3%以下的通胀率,经济与社会肌体就处于健康状态,各项改革就可以赢得回旋的空间。

◇营造“新常态”的持久动能

保持“平常心”并不是不允许经济出现较高的增长,相反更应提防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经济增长的失速,尤其要防止部分风险因素演化为局部危机。因此,在“新常态”之下,经济增长不再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出口”,而是逐步转向依赖于“投资+消费+创新”;不再依赖于房地产或其他某一产业的突击式拉动,而是转向于一、二、三次产业尤其高级产业的联动;不再依赖于加杠杆“捂风险”的方式,而是通过改革理顺权力与市场关系,发动市场力量进行资源重置,营造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动能。

由此,“新常态”之下的经济特征除了经济增长放慢速度外,还表现为,经济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作为三次产业的服务业比重或超过第二产业;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将日显活跃,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逐步上升;金融市场中债务风险得以渐次释放,直接融资的信用体制日渐健全;劳动者技能产出超过其他全要素产出,人口的城镇化占比不断扩大等。

观察发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就业不过85万人,而2013年,中国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却能提供17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这种比较可能未必科学,但其中一个重大变化不能不引人注意,即是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达到46.1%,而且今年第一季度该比例提高到了49%。这足以说明,虽然经济增速放慢,但经济质量正逐步加

强。另外,看经济增长动能,虽然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只有17.6%,但经济增速依然达到了7.4%,需求结构中的最终消费占比提高到了65%,说明国内投资收益率呈现边际递减态势,投资刺激经济的动能日渐减弱,作用于消费的因子开始得到激活。再看利率,尽管时下经济增速是2007年的一半,但贷款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当时相比都相差无几。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显露“新常态”的正面脉象。

◇“新常态”下的定点发力

因此,立足于经济“新常态”的清晰背景,彰显与强化经济“新常态”的正面能量,未来宏观政策将扭转以往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通过结构性和多角度的“散射”,向经济肌体定点发力——

在货币政策方面,日前发布的《2014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在继续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首次提出“保持定力,主动作为”这一新提法,除非发生诸如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企业大面积亏损、金融机构负债表严重恶化,央行都会有“定力”地保持住货币政策口径。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在“去杠杆”的同时须在总体上压缩投资规模。在总体遵循“微刺激”的原则下,财政资金将寻求集中性突破,如增加铁路投资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比重,扶持小微企业和棚户区改造,强化“三农”资金支持力度。与此同时,将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强化预算软约束。

在产业政策方面,基于“去产能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一方面将着力放宽市场准入,推动服务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在传统产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方式引入新的竞争因素,更新低层次产业的升级因子;与此同时,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同步进行。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高校的改革方向,1200所普通高等院校中未来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此举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从依赖于劳动力数量、土地规模供应等低端要素优势转向劳动者素质优化、岗位创新能量聚集等高端要素上来,以此推动新的产业结构成功落地。

(中国青年报)

周瑞金：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错失三次良机



编者按：2014年11月7日，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简称“大梅沙论坛”）开幕式在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隆重举行。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本届大梅沙论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下设几个分论坛，分论坛主题覆盖了法治建设、反腐、特区创新、互联网创新、金融创新、混合所有制发展、科技创新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在开幕式上做了精彩演讲。他认为，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周瑞金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说是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宪治国”，“以宪执政”，就是建立宪政的政治体制。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宪政的一种高度共识。

我已到古稀之年，与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一样，深切地关注着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我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即经济实力的巨大

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所形成的利益阶层固化现象，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

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需要一代领导集体大智慧、大胆略、大手笔，以强烈的时代责任心，真诚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情怀，来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我国政治体制形成简单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按照中国国情，以政治协商会议和《共同纲领》为构架，以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建立了以中共为核心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体制，民主党派许多头面人物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层。这对开国之初恢复国民经济，稳定政治社会局势，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美援朝战争，起了重大作用。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后，虽然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还在，但多党合作、联合政府情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政治体制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照搬了苏联政治体制的许多东西，形成“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民主党派成为在共产党领导和管理下的政治协商性的团体。

经过反右派斗争，在“左”的思想和路线影响下，我国政治权力越来越高度集中，从苏联搬来的政治体制弊端也越来越严重。在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30年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这一代人都亲身经历过运动不断、整人不止、瞎指挥、浮夸风、说假话、饿死人，直到“文革”大乱。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从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其

最初的出发点和基础。以邓、陈、叶、胡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正是从我国政治体制弊端的痛定思痛中,大彻大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下决心走出一条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路。

二、政治体制改革错失三次良机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一次是 1980 年 6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8 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代表常委作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于是,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后来,由于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工人大罢工,领导层担心国内局势震荡,便放缓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时隔六年,1986 年 5 月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6 月 28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发表讲话说,“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时,中央成立了五人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形成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顺利地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没有对外公布。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党政分开、协商对话、重大事情让群众知道、推动机构改革、基层民主等内容。这场得到邓小平全力支持、赵紫阳大力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 80 年代末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再一次失去良机。

第三次是 1997 年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官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当时主持十五大文件起草工作的温家宝同志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到中央党校听取了他们意见。后来,又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意见说,十五大提这个问题已经来不及了,要在十五大到十六大之间打算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想不到后来,又是由于发生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全会再次胎死腹中。

三、政改艰难的五条启示

回顾 30 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经历,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要正确把握战略机遇。危机逼出改革,挑战也是机遇。改革的领导集体要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高度负责的胆识和策略,要有 80 年代初邓小平力行退休制度和 90 年代初领导集体强推市场体制改革那样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2、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领导人果断调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要求领导集体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廉自律,勇于牺牲,至少力戒贪婪,不陷入钱色泥坑。

3、要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避免特殊利益集团以公权力名义垄断社会资源配置权和改革话语权,防止一些领域“国进民退”现象。在不能指望全能的政治权力壮士断腕的时候,由于政治权力本身也已经利益化,只能依靠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多元化推进改革。鼓励基层自治,扶持民间组织社会治理,这是政治改革的一种推动力。

4、意识形态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防止社会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空心化、虚伪化,导致社会知行不一,信仰空白。调查表明,地方干部最为信奉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西方民主,而是官场的“潜规则”。某些公权力的既得利益化,官员财产不敢公布,不能公布,以及大面积贪腐,使得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国之本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淡化。所以,30 多年的改革造就了伟大

的中国经济，却缺乏一种伟大的现代中国文化。我们能出口“中国制造”的产品，却在内心缺少一种阳光的自主的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表里不一，言行不一，损害了社会风气，急需弘扬改革启动阶段那种诚实坦荡、摧枯拉朽、奋勇直前的大无畏首创精神。为推动意识形态变革，一要推动网络媒体、都市媒体的发展，建设网络民主平台。二是推动新闻管理体制的改革，切实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放开体制内舆论，鼓励专家建言议政，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刺耳的声音。

5、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难度极大，又十分敏感，因此要注重制度设计和策略推进，少说多做，避免起哄，吊高胃口。要小步渐进，允许试错，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六条途径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说是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宪治国”，“以宪执政”，就是建立宪政的政治体制。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近代中国政党的发轫，始自清末立宪运动。在中国，“宪政”二字，就是从那时开始叫响的。然而，时隔一百多年，这“宪政”二字，依然难识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所谓宪政，就是以一种宪法大于天的超然力量，对各种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这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的一条科学路径，也是中国志士仁人奋斗了上百年，抛头颅、洒热血矢志以求的救国、兴国之策。

目前，党内外许多有识之士表示了深重的忧患意识，认为腐败的泛滥，使执政党面临巨大的合法性挑战，而剪除腐败最有成效的手段是对权力的制衡。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宪政的一种高度共识。我们要遵循法治文明的一般规律，学习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宪政。按这个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按以下步骤循序渐进：

（一）让依法治国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基本方略。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依法治国的决定，是个良好开端。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调整革命党的惯有思维，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和根本点，就是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制度。过去在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传统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即以党组织执政（党政不分）、以党的政策执政、以党的领导人直接执政的方式，要得到较大改变。党的领导将主要是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等途径，依法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各级党组织的执政重心，要转移到领导和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职能，发挥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人民团体机关有活力有担当的领导作用，加强制度建设，而且要保证党的政策的合法性。应当制定“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法”一类法律，来完善执政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的法律依据。

（二）以增强党的民主为中心，推动人民民主，不断完善社会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应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并能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如在部分县、市进行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以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发挥党员代表作用的新途径和新形式。同时，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党内将普遍实行差额选举，以保障党员自由选择的权利。建立一套民主程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保证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民主化，防止主要负责人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中央委员会也应进一步贯彻民主选举制度，以开拓党内民主选举的新局面。

（三）采取新举措新制度，不断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中国政治体制和运行

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许多严重腐败事件的产生,从根本上说由此而引起。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纪律巡视制度,逐步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要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推行领导干部公推公选制度,建立党代会、人代会对领导干部问责和质询制度。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制定新闻法保护媒体议政,对官员实施监督。

(四)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一步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结构,增加法律与社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确保依法履行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今后凡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人大必定公开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重视人民群众的诉求。同时,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也有决策权、监督权,尤其要对政府监督问责。人大在财政预决算方面将起重要的决策和监督的作用。政治民主是从财政民主做起的。应当加强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作用,建立起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并实行财政分权制衡体制。多党合作制度要发展,民主党派优秀人才要有职有权地进入政府、法院、文化、人民团体的领导岗位,也可以探索以党派形式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应当也可以办报,对执政党实行舆论监督。

(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的法治政府。

按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基本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不要干预微观经济,不要站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不要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要着力干好宏观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的事,把力气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

尽可能减少行政审批,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探索行政机构的改革整合新路径,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改变政府“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推进政府的决策透明、财务透明、用人透明,依法行政,诚信高效,推进行政信息公开,善纳民众诉求,探索建立一个民评政府、民评官员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坚决防止政府公共权力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防止让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政策化的现象出现。

(六)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公民行使民主权利。

我国长期实行由政府统包社会治理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基层群众缺少民主权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政治参与的诉求日益强烈,价值取向也日益多样化。所以改变“全能主义”模式,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即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市场的配置资源权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要制度安排提到重要议程。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一项引人注目的重要新制度。今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迈出新步伐,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并对基层干部、公务员实行民主监督。这一来,必定活跃民间组织,比如各种协会、学会、环保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真正让他们担负起社会责任。他们将更为积极地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共识网)

马英九首度评价 习近平执政风格：确实很强硬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近来在两岸关系上很忙，一方面表态挺占中，一方面要委托赴京参加APEC的萧万长传话。虽然不能登陆进行“习马会”，但是马英九今日首度开腔评价习近平的执政风格，马英九表示，习近平确实很强势，但基本上看来，两岸关系保持逐步发展，仍会维持现在的节奏与速度。

日前，欧美媒体驻亚洲特派员团访问台北，就两岸关系、台美关系、香港民主发展及东亚区域局势等议题提问马英九。

美国网络媒体《环球邮报》报道说，马英九小心回避了记者关于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提问。

但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外媒指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论对于台湾或区域的议题都展现比较强硬的态度，是个强势的领导人，是否对台湾的安全会造成更大的威胁？马英九又是如何评估习近平？

马英九就此回应称，习近平确实是很强势，但基本上看来，两岸关系保持逐步发展，仍然会维持现在的节奏与速度，要循序渐进才不会让两岸关系的发展偏离应有的轨道。马英九指出，两岸签订了21个协议，就大约花了5、6年时间。

喜爱运动的马英九还用爬山当例子，“就我个人接触20多年的经验，就好比是爬山，爬山的步伐不会很快，但是爬了几年后，回头一看会发现爬得这么高了。”

会中被问及中国大陆是否会真正实施“民主”？台湾能够提供哪些民主化的经验？马英九称，不会一味认为中国大陆会很快地走向“民主”，并表示台湾所努力的，是希望证明给全世界的华人社会看，一个本来是舶来品的民主，在纯粹中华的土壤上，也可以生根、发芽而且成长为一棵大树，“这是我们存在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马英九还说，大陆交换学生来台已经达到2万5000人，是两岸交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希望能让大陆年轻的一代，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实施民主？并鼓励中国大陆善待异议人士，并给予人民更多的自由，“因为当中国大陆能逐步自由化及民主化，两岸人民之间心理距离即可大大拉近。”马英九还说随着大陆愈来愈富裕，恐怕是难以避免民众增加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及参与公共政策的兴趣。

美国《环球邮报》报道，尽管香港“占领中环”学生示威等事件展示了北京日趋强硬的立场，马英九在仍然认为其两岸政策适合台湾。《环球邮报》说，马英九认为台湾人民密切关注香港局势发展，是因为要观察中国大陆会否信守承诺。

此外，马英九强调，台湾认同独立的人数已大不如前，甚至认为提出“台独”是帮倒忙。

但是，马英九称，一个国家不会宣布独立两次，中华民国于1912年成立，目前“完全没有必要再次宣布独立”。
(观察者网)



中组部如何选“补缺”官员

8月31日夜，一场暴雨突袭北京，大多数人赶回家中，享受周日最后的闲暇时光。而位于西长安街80号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大楼，却一直灯火通明，部分办公室到后半夜才陆续熄灭了灯光。第二天，中组部长赵乐际出现在山西，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山西省委书记任免会议。

按照惯例，省委书记的任免一般由中组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代表中央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书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书记任免才由中组部长亲赴当地宣布，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新疆。因此，赵乐际陪同刘云山亲临山西宣布省委书记任免，实属罕见的“高规格”。其原因，正如刘云山在讲话中所言，“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

当媒体还在挖掘背后的深意时，赵乐际已匆匆

离开山西。他的工作还有很多。十八大以来，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不断“打老虎”，而赵乐际领导的中组部则忙于选贤任能。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官方微信引用民间流行语概括道：“岐山一发力，忙坏赵乐际。”

山西省常委会缺员最多

中国有句俗语“一个萝卜一个坑”，用来比喻各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没有多余。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国机构编制与人员配置十分贴切。可随着中央反腐力度持续加强，拔走的“萝卜”渐渐多了。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十八大以来，共有近50名在职省部级官员落马，其中至少有11名在职省委常委，包括5名兼任省委常委的市委书记。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统计，在被查的省部级官员中，地方官员至少有33名，分布在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山西有7名，江西、四川各有3名，安徽、湖北、湖南、海南、云南各有2名，辽宁、江

苏、广东、贵州、陕西、青海、内蒙古、广西、天津、重庆各有1名。

官员落马意味着原有岗位的空缺。目前,我国正省部级岗位空缺两个,分别是李崇禧落马后空缺的四川省政协主席,以及李东生落马后空缺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在省委常委会中,缺员最多的是山西。相继接受调查的原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统战部原部长白云的职务仍然空缺,省委常委会缺员4人。江西、海南和黑龙江的省委常委会各缺员2人,不过并非都因官员落马。在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因涉嫌违纪被免职;而省委原副书记尚勇因为调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职位出现空缺。在海南,原副省长谭力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而三亚市委原书记姜斯宪则于年初调到上海任职,尚无人接任;黑龙江是由于徐泽洲和林铎两人陆续调出,留下了空缺。此外,湖北、宁夏和云南的省委常委会各缺员1人。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还注意到,目前各省人大、政协的一些职位空缺少有替补。这是因为各省人大、政协的职务调整一般在次年召开的人大、政协全体会议上实现。这意味着此类职位的空缺或将持续到今年底。

“补缺”方式:至少有4种

为填补落马官员留下的空缺,赵乐际带领的中组部力求科学选拔、精准任命。近期以来,已有约20位官员获得任命,到原本空缺的省部级职位上履新。

从“补缺”方式来看,有的是异地调动,如接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有的是中央“空降”,如接任海南省副省长的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陆俊华;也有地方官员上调中央;还有同系统或同地区调动,如张毅由国资委副主任升任国资委主任。

选拔继任者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今年7月20日,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被调查的消息得到证实,仅4天后,就宣布调武汉市原公安局局长赵飞

“补缺”。而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在去年11月落马后,经过了4个月才选出继任者——原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曾欣被任命为副省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组部选择不同的继任者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比如任学锋调任广州,最大意义在于异地‘空降’打破了广州官场的升迁规律。”

汪玉凯介绍,30年来,包括万庆良在内的9任广州市委书记,仕途均在广东起步,并长期在省内任职,而任学锋此前一直在天津任职。任学锋今年49岁,河北邢台人,曾长期在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2008年当选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政府的官网显示,任学锋主管领域主要是服务业、商业、旅游、外事等。

据广州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政府系统内所有公务员的升迁、平调、离职等工作都暂停下来,因为万庆良的案件还未查清,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跟他有利益关系。“任学锋与广州官场并无联系,也没有利害冲突,对解冻广州的局面大有帮助。”汪玉凯说。上任后不久,任学锋走访了广州市各大机关,要求各机关同心协力,做好工作。整饬广州官场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新晋云南省副省长张祖林则是当地提拔的典型。张祖林现年55岁,云南昭通人,从政前曾在媒体工作了近10年,被称为省内“最懂新闻”的领导干部之一。1991年,张祖林任楚雄州永仁县副县长,正式步入政坛。20多年来,张祖林先后在楚雄、昆明、玉溪等多地任职,人们普遍认为他能出任云南省副省长与其反对过度拆迁有关。

张祖林曾任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长达5年,期间昆明获得了“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但他公开反对大拆大建。2010年8月,张祖林现场调研滇池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情况时,曾说:“我们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老百姓的。”2012年12月,张祖林调任玉溪市委书记,刚上任却把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市委大院给拆了,将市委办公地挪至早就建成的高新区办公楼。对此,张祖

林的解释是：“虽然一年要付300万租金，却把市中心的地块腾出来，每年能提供上亿的税收，这个账不言而喻。”他曾说：“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中，一定要遵规守纪，不要插手工程。只要你走得正行得直，挨点骂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如今，云南的落马官员多和城建工程有关，而张祖林没有受到影响。

从地方上调中央，也是一种重要的选拔形式。在中央部委里，新任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就是个例子。吴新雄1949年生于江苏，1967年参加工作，2001年出任江西南昌市委书记。据江西一位干部回忆，吴新雄在江西的10年有成绩、有魄力。因为不是本地人，吴新雄曾笑称自己是“进口老表”（老表是江西人对老乡的称呼）。刚到南昌时，他曾手把手教南昌的干部如何搞活企业、如何抓大放小。任江西副省长、省长期间，吴新雄连续9年出席了内地各省市的“香港招商周”，使江西有6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中部省份。2011年6月，吴新雄被任命为电监会主席。外界普遍认为，在电改迟迟无法推进之际让吴新雄掌管电力，是中央看中其“啃硬骨头”的劲头。还有人预言，吴新雄任电监会主席不会是过渡选择。果然，刘铁男落马后，吴新雄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电监会也并入改组后的国家能源局。

央企领导人也是此次干部“补缺”的重点。2014年4月，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4月23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育宁调任华润董事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央选择傅育宁，主要原因是招商局集团和华润集团同为在港中资企业，傅育宁熟悉香港情况，能够在短时间内稳定华润的局面。

选人标准：倾向于干净、有专业能力

什么样的干部才能在反腐风暴中获得“补缺”？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言简意赅地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补缺’干部的选拔，首先要选干净、不会被腐败污染的官员。”

在中纪委一系列反腐动作后，中组部选拔“补缺”官员慎之又慎，坚决防止“补缺”官员再度腐败。任建明认为，王儒林从吉林调任“官场地震区”山西担任省委书记，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这次山西省委书记换人，固然可以按照惯例，在本系统内照常递补。但长远来看，从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小圈子里选拔，依然避不开其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层推进。而从外部调一个人进去，能够快速恢复秩序。”

61岁的王儒林曾用“生在吉林，长在吉林，熟悉吉林，热爱吉林”来形容自己。在4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从未离开过吉林，在吉林干部、群众中的口碑不错，“王儒林没有‘歪的斜的’，做事‘实打实’”，“为人正直，没有私心，雷厉风行”。2013年，中央巡视组进驻吉林，从公布的巡视情况看，吉林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在此轮反腐风暴中，吉林没有查出一只“大老虎”，这让人们对王儒林此次调任山西心怀期待。

汪玉凯则认为，此轮选人标准，除了“清廉”“关系干净”外，也看重符合岗位职责的能力和纵观全局的政治视野。此次“补缺”官员多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起，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累积出与职位相符的能力。人们也更愿意相信，从基层锻炼出来的干部扎实稳健，能办实事。比如吴新雄曾在江苏省江阴长江服装厂当工人；王儒林当过知青、工人，干过乡党委副书记、副县长，之后又历任地级市领导、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有助于王儒林迅速掌握山西情况，尽快开展工作。”汪玉凯说。

任建明认为，十八大之前，一个地方因反腐出现职位空缺，调一个官员过去，更多是为了迅速恢复官场系统稳定，“往往新官员一到任，反腐就画上句号，他的任务就是恢复稳定、发展经济”；但十八大之后，“补缺”官员更多的是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现在调你过去，改革、发展、反腐败要统筹推进。就像弹钢琴一样，要在改革发展不掉队的同时持续反腐。这对继任官员的政治经验要求很

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此外，重视高学历、复合型人才，是此轮干部任用的另一个标准。汪玉凯介绍，很多新提拔上来的干部都具备专业学历。如任学峰毕业于河北工学院，还是南开大学的管理学博士，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外语流利。吴新雄年少时由于时代限制，读书并不多，但工作后先在南京化工学院有机系学习，又在上海国际金融学院读了MBA。吴新雄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其高级经济师的背景，让当时南昌的干部们都深表敬佩。张祖林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工作后曾先后在云南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班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英语十分流利。傅育宁也是个“学者型商人”，拥有博士学位，对资本市场非常了解，对集团的多元化发展也颇有心得。

中组部长赵乐际也是从基层做起

纵观此次新调整的干部，不难发现，他们多数从基层干起，年富力强，文化素质高，专业能力强。这些特点与现任中组部长赵乐际本人也极为相似。

1957年3月，赵乐际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他曾形容青海对自己的影响：“我从一名普通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青海烙印，深深打下；青海情结，刻骨铭心；深情眷恋，难以释怀。”17岁时，赵乐际成为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一名知青，之后成为工人，第一份工作是在青海省商业厅当基层通讯员。

1977年，赵乐际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3年后，赵乐际返回青海，在青海省商业厅政治处工作，并先后在青海省商业学校担任老师、教务科副科长和商业厅团委书记。由于在商业厅的出色表现，赵乐际被派往当时商业厅下属单位——青海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出任党委书记、经理。到1991年，赵乐际已经是青海省商业厅厅长、党委书记。在商业系统锻炼了十

几年后，从1993年起，赵乐际先后出任省财政厅厅长、青海省副省长、省长。2003年，46岁的赵乐际被任命为青海省委书记，成为当时政坛“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赵乐际主政期间，青海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由2000年的263.12亿元增加至2003年的390.16亿元，2006年达641亿元。除了经济表现突出外，他也特别重视环境保护，早在2001年就提出：污染环境的企业不要转移到青海，并建立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自然保护区。

因为父母都是陕西人，赵乐际虽然长在青海，却一直说陕西话，连做报告也不例外。2007年，赵乐际回到故乡陕西任职，当时他的弟弟赵乐秦正担任陕西汉中市委副书记、市长。为避裙带之嫌，赵乐秦于次年1月南调广西贺州市，出任市委书记。这在陕西一度传为佳话。因为特别重视民生，赵乐际还获得“亲民书记”的美誉。他抵陕就职不到一年，足迹遍布三秦大地，每到一处必先问百姓民生，尤其是他在陕南山区说的“扶贫决不能遗漏一人”，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2012年，赵乐际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从赵乐际本人和新选拔的“补缺”官员的共同特点上看，在新一轮用人之际，中央对干部任用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标准。

（环球人物周刊 黄滢 姜琨）





中国想继日本之后成高铁代名词

不顾一切修铁路

参考消息网 11 月 6 日报道外媒称,一连串在国内外修建新高铁的消息或许表明决策者忧心忡忡。电力、货运、钢铁和批发价格的指标下跌,都要求实施国家主导的财政刺激措施。修建铁路是广受欢迎和称道的振兴工业的手段。尤其是 2008 年以来,高铁项目成了北京首选的刺激方式,也变成了地缘政治的工具。

这是维持增长的明智还是权宜的手段?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 11 月 4 日称,都是。无论是围绕 GDP、土地面积还是人口进行国际间比较,中国都确实“需要”更多的铁路,其城市化项目需要大规模而且快速的人口流动。但城市规划者质疑高铁的价值。高铁对大城市有利,但通勤可能会在城市外围制造大片“睡城”。

报道称,经济方面的回报仍不确定。只有几条高铁线路是赢利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债[0.10%]务缠身,其欧洲同伴也没什么两样。在日本,只有东海道新干线利润丰厚。台湾地区高铁同样濒临破产。英国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为高铁的可行性犯愁(中国对这两个项目都有兴趣)。

不过,报道认为,社会回报可能与经济回报有所不同,而北京指望高铁在经济方面促进城镇化。因此,中国大力实施一项令人生畏的计划,要在 2020 年之前把各大城市连接起来。最终,中国高铁的长度可能将达到约 4 万公里,超过全世界高铁总长度的一半。

报道称,中国在铁路方面的国际雄心更引人关注。从墨西哥、塞尔维亚到津巴布韦,中国的铁路公

司都很活跃。然而,真正的至宝是从中国扩散到欧亚大陆边缘及之外的庞大高铁网络:莫斯科、伊斯坦布尔、新加坡和阿拉斯加。

报道称,最近与俄罗斯签署的备忘录令人吃惊。未来的北京-莫斯科铁路长 7000 公里,可能最终将花费 2500 亿美元。分析人士预言,届时将同时运行数百列火车。这表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联系在显著加强。

报道认为,这些项目确实扩大了影响力,也彰显了技术实力。50 年之后的今天,中国想继日本之后成为高铁的代名词,“就像手表之于瑞士一样”。连中国的软实力机构都大谈“高铁精神”。新丝绸之路网络将减少中国在海洋上的风险,同时加强与邻国的联系。这些邻国都是心甘情愿的伙伴。这是“双赢”,但中国可能赢得最多。

报道称,无论是通过新的多边机构(中国引领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明确专注于丝绸之路的高铁项目)还是双边行为,中国都会不顾一切地修建铁路。中国资源丰富。该国没有波音飞机或丰田汽车可卖,但它有高铁,将会自掏腰包在任何地方修建铁路。北京可能会把两家国有机车制造企业合并成一家极具竞争力的出口企业。

中西部多一城独大 东部沿海多“双子星”

由于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源,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一般也不低。不过,各省情况差异也比较大,中西部省份对省会的依赖度要比东部沿海高出不少。



中央电台

当年如何报道林彪出逃事件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

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真相，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

自“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

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中央电台的整个节目的内容、口径变了个样。

当一切做好准备，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后，出人预料的情况仍没发生。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



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

当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

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

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只能小心翼翼。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报上级认可后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是从有利于稳定局势、有利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的。对于广播宣传来说,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审时度势,尤其在复杂多变的重要时刻,更要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人民网 微博 杨正泉)

